

16.02

开封文史资料

第四辑

8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开封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多譽愛國主
義旗幟實多
求是他做
文史資料作
楊成武

一九八六年五月 楊成武副主席莅汴視察工作時
為《開封文史資料》題詞

目 录

冯玉祥五原誓师前后见闻杂忆	宋聿修 (1)
我所知道的一九三〇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内幕	艾经武 (11)
我参加一九三六年国民党国大代表选举 的简况	邢汉三 (22)
张钫关怀河南流亡师生	王年农 (28)
忆黄樵松将军在汴片断	张黎至 (30)
回忆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 党领导的河大学生运动	任勳平 (33)
“六·二”学运中一组场景——	
河南大学晋京请愿代表团活动记略	丁 力 (51)
“五卅”运动在开封	李光一、吉新报 (62)
对张轸部队起义后的改造情况	曾五奎 (72)
一个质朴而伟大的教育家——孟坚垣先生	黄勉中 (78)
名医陈少坪事略	陈再坪、寒 山 (84)
河南农工银行与李汉珍	渠 鑫 (88)
心心社与《心音》杂志	沈 毅 (103)
漫谈解放前的河南中华圣公会	陈万瑞 (112)
汴京风土摭陈	陈雨门 (123)
开封斗鸡	高秀峰 (136)
古汴乞丐生涯	冯荫楼 (152)

〔补 白〕

柳池的来历

(170)

〔质疑·辨正〕

对《清末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河南省军政机关

沿革及人事动态小记》一文的质疑

刘博仁(167)

关于“六·二学运”一词的辨正

张四德(168)

〔勘误〕

《开封文史资料》第三辑勘误

(171)

〔附〕

政协开封市第五届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 (172)

《开封文史资料》编辑小组名单

冯玉祥五原誓师前后见闻杂忆

宋 聿 修

冯玉祥将军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后套地区的五原县，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率全军加入中国国民党，誓师参加北伐战争，到今年整整六十周年了。我作为五原誓师的参加者，对当时情况记忆犹新，但那时我还是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的一个学生，没有参与重要决策的可能，只是从表面上有所见闻，知其梗概。现就回忆所及，把誓师前后情况简要记述如下：

一九二六年春，奉、直两系军阀以“讨赤”为名，对国民军发动全面进攻，原为国民二、三军驻守的河南、河北两省相继为敌人夺去，这时冯玉祥将军觉得形势对国民军不利，决定离开部队，赴苏联参观学习。他希望在他出国后，“大家都能痛定思痛，毅然悔悟，赶快化除仇怨，停止祸国殃民的内战。”（见《我的生活》第三十二章）在他临走时，对送行的石敬亭等人又说：“目前这个战事是无边无沿的，我一走之后，也许可以釜底抽薪，让他们少些兴头。”（见《我的生活》第三十三章）于是便以张之江继任西北边防督办，刘郁芬继任甘肃军务督办，鹿钟麟继任察哈尔都统，蒋鸿迁继任绥远都统（原任都统，李鸣钟作为国民军代表前往

广东)。于三月二十日离开平地泉(今集宁)经外蒙前往苏联。

但是，他的“飘然下野，去国远游”(归国宣言用语)并没有感动奉、直各派军阀，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反而使他们认为冯玉祥离开后，国民军已“群龙无首”，正好乘机把他们彻底消灭，于是更加紧了进攻的步伐。一九三六年四月间，国民军被迫撤出天津、北京等地，退守南口及热河、察哈尔边界一带，以保卫察哈尔、绥远、宁夏、甘肃这些根据地。奉直各军大举进攻，战况异常激烈。不久阎锡山也加入反对国民军的战线，以重兵进出雁北，企图截断京绥铁路，与奉、直各军协力，将国民军主力歼灭于张家口一带。在此情况下，国民军决定以精锐部队，对山西采取攻势，企图打破缺口，扭转战局。但终以兵力不足，顿兵于大同天镇等坚城之下，未能有所进展，只是勉力维护京绥铁路交通，未致中断。

一九二六年四月至八月，国民军在奉、直、晋军围攻中，苦战四个多月，终以弹尽粮绝，无法支持，乃于八月十五日下令向绥远、包头一带退却。在退却途中，部队争先恐后，指挥失灵，纪律也不能维持，形成一片混乱状态。消息传到莫斯科，冯玉祥乃于八月十七日偕同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谢里给也夫、共产党人刘伯坚，以及随员何其巩、李兴中、任右民等首途归国。途经库伦(乌兰巴托)时，原拟乘汽车直奔包头，途中遇到张允荣、宋哲元等，知道鹿钟麟、孙岳、方振武等都在五原等候，乃改向五原前进，于九月十五日到达五原。当时的五原县城是一个方形的土寨子，城内除了县衙门以外，只有些住户，商店也很少。县立高小设在南门外的东边，我们干部学校学生就住在里边。县城东南大约三里远的地方，有一个集镇叫作隆兴长，算是后套的经济

中心，有些绸布店、百货店、杂货铺、饭馆、旅店等。城里人买东西，都要到隆兴长去买。

冯玉祥到五原后，就住在县衙门里，以后成立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当时的情况是：

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已经过五原前往宁夏；鹿钟麟、宋哲元、孙岳、方振武等都在五原；国民第一军第四师冯治安部驻在城内及其附近；国民第三军第六旅续培模（范亭）部驻在隆兴长街上；国民第五军方振武部驻在附近村庄；国民第一军有些部队正陆续经过五原开往宁夏，其中第十二师孙连仲部已经过去，第十师刘汝明部和第十一师佟麟阁部正在经过；还有一些残破部队官多兵少，冯将军都命令他们把士兵交给完整部队带走，官长交给宋哲元成立了暂编第一师（有官无兵，等待招新兵训练）。

五原东北四十多里有一个大镇叫做乌兰脑包，周围农业较发达，粮草不缺。在那里驻有国民一军的骑兵第五师赵守钰（友琴）部，国民第二军第四旅胡德辅部和第六旅张英超（兆丰）部，另有弓富魁（海亭）部原属国民第二军，这时自己改称国民第六军，也驻在乌兰脑包。

这时归绥（呼和浩特）已被晋军占领，商震被任为绥远都统，国民第一军等一师师长韩复榘、第三师师长陈希圣、第六师师长石友三等都向商震投降，韩复榘部被编为晋军第十三师，驻在归绥；石友三部被编为晋军第十四师驻在包头；陈希圣部被编为晋军第十五师，驻在武川。另外，韩占元、张万庆等部，也驻在包头附近及固阳等地，就地筹措给养，意存观望。至于徐永昌（次辰）所率国民第三军主力，原来也在包头，以后率部渡过黄河，向陕北开去，声称往解西

安之围，后来投奔阎锡山，成为晋军骨干之一。

当时在宁夏驻有马福祥旧部两个师，马福祥的儿子马鸿逵任国民第一军第四师师长，马福祥的侄子马鸿宾任国民第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在兰州驻有刘郁芬带去的国民第一军第二师。在南口激战之时，原驻平凉的土著军队张兆铎部与原驻天水的土著军队孔繁锦部，受吴佩孚唆使，联合进攻兰州，企图夺取甘肃地盘。刘郁芬督率孙良诚、张维玺两个旅奋勇反击，终将张、孔两部击溃。在冯玉祥回到五原时，孙良诚已占领平凉，张维玺已占领天水，甘肃形势已基本上稳定，但张、孔残部董得贵、韩有禄等尚流窜于庆阳一带，扰乱地方。这时孙良城升为国民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张维玺升为国民第一军第十三师师长。

当时国民第三军的杨虎城部和国民第二军的李云龙（虎臣）部，被刘镇华部包围于西安城内，已有数月之久，形势危急。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冯玉祥在五原召开了国民军各军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将国民军改称国民联军，公推冯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当天冯氏发表了《归国宣言》（原文见《我的生活》等书）。九月十七日正午，在五原城内县政府西面的一片空场里，临时筑的土台上，举行了国民联军总司令就职誓师授旗典礼，驻五原附近的高级将领，文武官员和冯治安所率领的第四师部队，以及我们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在五原的二百多名学生，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共约一万余人。典礼由刘伯坚主持，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将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大旗）授于冯玉祥将军，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记得他曾兴奋高呼“从今以后，老

子真正赤化了。”冯玉祥在读了誓词之后，也发表了讲话，他解释“赤化”二字，说赤化就是革命化、流血化，谁肯为革命流血，谁就是赤化。最后刘伯坚也讲了话，他着重讲了国民党的三大政策。（抗日战争初期我还去看过那个誓师台）。

冯玉祥宣誓就职后，即着手组织总司令部，当即任鹿钟麟为总参谋长（不久鹿率一个代表团赴苏联参观，由石敬亭继任），何其巩为秘书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刘伯坚为副部长（石调任总参谋长后，由刘伯坚代理部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廷瑗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璜为军法处长，缴文龙为军医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其中政治部和内防处是向苏联红军学习而设立的新机构。政治部的任务是，以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为主，并从事宣传和民众工作。内防处则是仿照苏联的“格别乌”，进行防谍及侦探活动的，其中分为内探与外探两组。不久，张允荣被派往库伦接运苏联援助的军械弹药，内防处就取消了，其业务由参谋处和军法处分别接管。

我们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原是一九二五年夏天冯氏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在张家口成立的。当时正是“五·卅”惨案以后，青年学生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要求投笔从戎，冯氏乘机在北京、张家口两地，招考了约有七百名学生（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成立了这个学校，在张家口训练了一年多，随着战局的变化，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底撤退到包头，在那里举行了毕业典礼，领到毕业证书的约有五百人。毕业后有一部分分配到驻在包头附近的各部队去工作，还剩

下二百多人，由主任教官何正权率领，从包头到达五原，准备以后分配到驻宁夏、甘肃各部队去。五原誓师以后，冯玉祥决心效法苏联红军，在各部队普遍设立政治处，开展政治工作，便决定把这部分学生改组为军事政治速成学校，进行短期的政治教育，作为开展政治工作的骨干。当即任命张允荣为校长（不久张允荣被派往库伦，由骑兵第五师师长赵守钰兼任校长），刘伯坚为教育长，讲课者有刘伯坚、任右民、王一飞和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谢里给也夫等，冯玉祥、孙岳、鹿钟麟等，也时常到校讲话。主要课程有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帝国主义论、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政治纲领及党章、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国民军的历史等等。训练了约有两个月，于十一月中旬结业后，即分配到各部队去建立政治处，开展政治工作。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五原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国民联军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国民联军最高特别党部，选出方振武、刘伯坚、任右民、赵守钰、王一飞、张兆丰、续培模、张允荣、武勉之、弓富魁、石敬亭等十一人为执行委员。卢召亭、张树声、孙金宣、何其巩、白龙亭、张海如、李宝铨等七人为后补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刘骥、史宗法等五人为监察委员。刘廷森、刘仁辅、李鸣钟等三人为后补监察委员。其中一部分是国民党老党员，一部分是共产党员，一部分是国民军的高级官员。

在总司令部和党政机关组织就绪之后，即着手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根据当时情况，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是，以主力向绥远、察哈尔反攻，然后进出北京，与由广东出发的北伐军南北呼应，夹击奉、直军阀。第二种是，两路

出去，一路反攻绥远、察哈尔，一路经甘肃转入陕西，解西安之围以后，东出潼关。第三种是，放弃绥远，集中主力，经甘肃入陕西，然后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河南。这时接到李大钊派人自北京送来的密信，认为奉直联军尚相当强大，国民军沿京绥路反攻，不易奏效，不如以全力经甘肃入陕西，然后进取河南为有利。同时李石曾也由北京派人来送信，说阎锡山态度转变，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冯玉祥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经与主要将领商议后，决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战略方针。

方针确定之后，首先命令已到宁夏一带的第十一师佟麟阁部向天水前进，增援陇南的张维玺部；命令已到宁夏的第十二师孙连仲部和尚在途中的第十师刘汝明部向平凉前进，增援陇东的孙良诚部，以巩固甘肃局势；然后命令方振武为援陕第一路总指挥，率领所部经宁夏、平凉进入陕西；以弓富魁为援陕第二路总指挥，率领所部随方部之后入陕（该部成分复杂、纪律松弛、迟迟未能出发，后被石友三部缴械）；以孙良诚为援陕第三路总指挥，（后又兼任援陕前敌总指挥），即率所部由平凉向西安前进，向刘镇华部攻击，解西安之围；以马鸿逵为援陕第四路总指挥，率领所部由宁夏出发，向陕西前进；第四师冯治安部和骑兵第五师赵守钰部，随总司令暂驻五原一带，保卫治安，维护交通。

冯玉祥在五原大体部署就绪之后，即决定到包头去，想把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部拉回国民军来，率领他们一同经甘肃、陕西，进入河南。韩、石、陈各部，都是国民第一军中能征惯战的精锐部队，而且他们停留在绥、包一带，

把一些败退下来的零散部队，都收容补充到他们的部队中，有些从前线退下来的炮兵，也大部分编入他们的部队，所以他们的实力都相当充足。因此，能否把他们从晋军中拉回来，就成了国民党成败的关键问题。冯玉祥认为，这些部队的官兵，都是经他亲手训练过的，对他甚为信仰，这次向晋军投降，是在他回国以前发生的，可以认为并不是对他的背叛。现在他既已回来了，亲自去把他们拉回来，是完全可能的。但张之江（这时由宁夏返回五原）则认为，他们既已投降敌人，势已无可挽回，冯氏如亲自去包头，有可能发生危险，所以极力劝阻冯氏赴包。

过了几天，石友三忽然自己来到五原，当面向冯氏请罪，并表示愿意把队伍拉回来。于是，冯氏更坚定了去包头的决心。据传说：石友三在包头听到冯氏回国的消息之后，何去何从？他反复思考，犹豫不决。他的父亲对他说：“你从当兵就跟随冯先生，冯先生一步一步把你提拔起来，你才能有今天。你决不能忘恩负义，背叛冯先生，否则我就不承认你是我的儿子。”石友三这才决定亲自到五原向冯氏请罪。

石友三回包头之后，冯玉祥接着到了包头，随行的有薛笃弼、张允荣、刘伯坚和乌斯马诺夫顾问等。到达包头时，石友三和住包头附近各高级将领及部队列队郊迎三十余里，欢声雷动。当时王瑚（铁珊）先生也出城相迎，他对冯氏说：“你来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冯说“为什么呢？”王说：“他们自官长以至士兵，没一个不是想念着你。知道你要来，人人都欢喜得流泪，你一来到，天大的麻烦事也可以迎刃而解了。”后来王老先生也作为顾问随冯经宁夏、甘

肃、前往陕西。

冯氏到包头后，就连续召开驻包头一带各部队的军官会议，详细解释国民军参加国民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国际国内形势和国民革命的前途等等，借以使各级军官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树立对国民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接着分别到各部队检阅讲话，借以鼓舞士气，整顿纪律。由于冯将军崇高的威望，和他深入浅出的谆谆教导，很快就使那些打了败仗，军心涣散、纪律松弛的部队，从新振作起来。

当时韩复榘尚在归绥，正在医院养病，冯氏打电话问他如何打算，他随即派代表到包头，向冯氏表示绝对服从命令。冯氏告诉他要作好准备，待命开拔。驻在武川固阳一带的陈希圣部队，因为陈希圣已因病离开，各部队长也都来到包头，向冯氏表示决心回归国民军，服从指挥。冯氏也分别派政工人员，去做宣传工作。

冯氏在包头做好各部队团结工作之后，即任命石友三为援陕第五路军总指挥；韩复榘为援陕第六路军总指挥；门致中为援陕第七路军总指挥（原陈希圣部及韩占元、张万庆等部编入该路）。并决定按第七路军、第六路军、第五路军之次序，先后向宁夏开拔。冯氏对路经包头的部队，都亲自检阅讲话，并稍加整顿。所以从包头西开的部队，都已军容整肃，士气高昂了。

冯玉祥在包头，曾与驻在归绥的绥远都统商震通电话，因为他们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朋友，可以无话不谈。他劝商保持光荣历史，早日回到国民革命阵营中来。商答以时机尚未成熟，暂时还不能表明态度，你那里缺乏什么，我一定尽力帮助。所以原来投降晋军的部队西开时，商震均任其开

走,并未加以阻挠。

冯氏在包头时,广东和各方面的代表纷纷前来联系,有的带有秘密文件和各方信息,有的提出建议和推荐人才。特别是李大钊先生,介绍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帮助国民军开展政治工作,对于提高部队官员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精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冯氏在包头住了约有一个多月,门致中和韩复榘两部队已陆续开拔完毕,只剩下石友三部作为掩护部队尚在包头。这时在北京的张作霖,听说冯玉祥回国后,重整旗鼓,声势复振,深恐国民军沿京绥铁路反攻,又派部队进入绥远,马占山所率骑兵已向包头进逼。冯氏乃于十一月中旬返回五原,并令石友三部完成掩护任务后,即放弃包头,向宁夏开拔。冯氏回五原后,即命令仍留在五原的赵守钰、弓富魁、续培模、胡德辅等部,陆续向宁夏开拔,他自己也带领总司令部人员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离开五原赴宁夏。

军事政治速成学校结业后,我被分配到骑兵第五师赵守钰的司令部做政治工作。骑兵第五师西开时,我正患病,未能随行。不久,骑兵第一师田金凯部由包头开到五原,该师的参谋长是原干部学校的队长,参谋也都是干部学校同学,我病好就到该师参谋处工作。该师是石友三第五路军的部队,在五原负责掩护其他部队西开。大约到了十二月中旬,奉军先头部队,马占山部骑兵已进至五原附近,骑兵第一师乃撤离五原,向宁夏前进。次日下午,行至五原临河间的邹家地附近时,马占山部尾追而至。师长田金凯因为有些步兵部队和行李车辆尚在途中,便决定利用几个村庄,进行抵抗,以免友军遭受损失,于是在这里展开激战。战至日暮时,田金

凯在一个院子里召开了主要军官会议，被奉军发现，乃用迫击炮向这里射击，（奉军骑兵携有迫击炮），师长田金凯、参谋长郭中敏和旅长时念新等均受轻伤。入夜后，田金凯率部西撤。马占山部也受了相当伤亡，未再追击。

弓富魁、续培模、胡德辅等部，因行动迟缓，直至奉军逼近五原时，才仓皇西开，而且大部分行伍不整，纪律松弛。在行至临河以南的三盛公时，大部分被石友三缴械遣散，听说有抗不缴械者，当场被打死不少。胡德辅闻讯率部渡过黄河，逃往陕西，后来被宋哲元消灭。听说续培模（范亭）见到冯玉祥后，深表不满，他说他所带的国民第三军第六旅，纪律不比国民第一军部队差，为什么也被缴械遣散？冯对他表示歉意，说是出于误会，并发表他为军官学校校长，以表示安慰。这也算是五原誓师期间，一幕小小的悲剧。

截至一九二六年底，国民联军部队已全部离开绥远省境，其主力陆续经宁夏平凉进入陕西。十一月二十七日击溃刘镇华部镇嵩军、解了西安之围，又乘胜追击，收复潼关。一九二七年五月进军河南，一路势如破竹，六月初即与北伐军会师郑州。

九八六年六月十日稿

我所知道的一九三〇年蒋阎

冯中原大战内幕

艾经武

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武汉西湖编遣特派员公署派我到宜昌工作，春末到南京去见蒋介石，蒋叫我在京候命。后来蒋叫我与孙祥夫（注）一同到天津工作。蒋对我说：“你要很好的跟他们工作，不要多说话，孙祥夫住在中央饭店，你可去见他。”当天下午我去看孙祥夫，孙对我说：“校长派你跟我工作，我很高兴。”孙问我：“校长对你还交待了啥？”我回答说：“校长叫我跟你好好工作，要听话。”孙笑着说：“我与校长是老友，是盟兄弟，我办完手续就走，你可以来这里一同吃饭。”我答应了。当时我在南京听到不少新闻：听说汪精卫在北平召集扩大会议反蒋，汪的改组派人员都到北平活动去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也派人到北平参加了会议；山西阎锡山也参加了会议；又听说张学良的东北军也要参加。还听说总部秘书长邵力子带十万元亲自到上海去找樊钟秀劝他跟着南京中央干，樊钟秀见到邵力子，当面对邵力子说：“这钱我不能用。”邵说：“中央对你很关怀，总司令对你尤为器重。”樊说：“明人不做暗事，我在上海不能过了，回到河南就有钱花，请你把钱送回中央吧。”邵力子回到南京后，樊钟秀即离开上海到北平去了。

我在中央饭店孙祥夫处见到了福建保安处长杜起云，孙祥夫介绍说：“校长派他和我们一起到北方去工作。”我说：“那就太好了，又添了一位重要人物。”我们在南京没停几天，就来到上海。这时我才知道孙祥夫、杜起云与上海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都是朋友。在上海没有久停，我们一行即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到天津后，住在租界地的饭店里，这时孙祥夫在天津的朋友全都来了，应酬了几天后，才在日租界租赁了四层楼一处房，并在英租界、法租界旅馆里均开有长期房间，专为招待各方友好之用，以便在天津开展工作。我初到天津，一切均感到不便，尤其是对这种秘密工作，总是担心害怕，不敢走出租界一步，老是害怕有人在后边跟踪，真是有点做贼心虚。加上孙祥夫告诉我无事不要去“中国地”。我除了在租界地自由活动外，不敢越雷池一步。

一、在天津开始工作：

当时我感到这种秘密工作很不容易，因为来往接触的人物，都是“不可知数”，谁代表谁不知；谁想干啥也不知；谁真谁假一概不知；每天只是送往迎来，忙忙碌碌。有一次孙祥夫与我秘谈，要我往太原去见杨爱源，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他，而且路过北平时，若遇见我的改组派的同学，就不好办了。”孙祥夫说：“既然如此，那么以后再说吧。”但我们在天津时对消息还是很灵通的，当时我们知道南京中央已派吴铁城到奉天拉拢张学良，因为当时张学良态度不明，也知道阎冯派两代表到奉天活动。同时还知道方本仁到天津转北平往太原，又到奉天，代表南京中央活动。方本仁原是北